

***Making Borders in Modern East Asia: The Tumen River Demarcation, 1881-1919.* By NIANSHEN SO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303pp.**

*Making Borders in Modern East Asia: The Tumen River Demarcation, 1881-1919* (《製造現代東亞邊界：圖們江劃界，1881-1919》)是馬里蘭大學巴爾的摩部分校歷史系助理教授宋念申的著作，出版於2018年，是關於中朝邊界研究的一部新作。

圖們江發源於長白山，是中國與朝鮮的界河。本書除導言和結語之外，正文共有六章。導言部份，作者以1931年界碑（Mukedeng stele: 穆克登碑）的消失作為切入點，追溯界碑的緣起。1710年的兇殺案引發對圖們江的調查和劃界，清和朝鮮共同到長白山頂尋找圖們江源頭。1712年，清朝官員在分水嶺上豎立界碑，並要求朝鮮建造一排土木柵欄，將石碑與圖們江源頭連接起來。當朝鮮人修建柵欄時，發現這條小溪是松花江的支流，但並未將錯誤告知清朝，負責督修的朝鮮官員任意修建一道屏障，連接南部的另一條河流。這為後來的邊界爭端埋下伏筆。

第一章主要論述圖們江地區的歷史以及清與朝鮮如何看待和管理該地區。圖們江作為明、清王朝與朝鮮的邊界，雙方都禁止屬民非法越界。對於清朝來說，滿洲是神聖的家園，禁止民人進入墾荒，直到19世紀中葉才逐步解除禁令，允許民人進入禁墾區開墾和定居。朝鮮則以河流作為天然屏障設置軍事駐地，移民實邊。朝鮮在該地實行的政策有別於其他地方，「似乎所有措施都旨在將該地區與該國其他地區隔離開來」，但並不能阻止人們向北方遷移。後來，由於受自然災害影響，朝鮮地方官鼓勵越界開墾，所以很多朝鮮人獲得土地執照。清廷知曉此事後，要求他們向吉林將軍納稅，但朝鮮要求遣返非法移民。雙方為了證明主張的正當性，都採用宗藩話語體系。雖然清朝同意遣返移民，但依然未能阻止人們越界。1883年清和朝鮮談判貿易條約，朝鮮地方官向本國使者反映邊界問題，康熙時期劃界中的錯誤被發現，由此引發邊界爭端。

第二章主要論述19世紀80年代清與朝鮮的劃界過程，作者從王朝地理觀念、劃界比較、邊疆地圖學等方面探討地理知識與權力結構在劃界中如何相互塑造。作者將傳統時期地理著作中地區的代表方法稱為「王朝地理學」，但他認為傳統的王朝地理知識是一種說辭而非文本證據，競爭的雙方都會拿

來用。在康熙皇帝的主導下，通過祭祀和將長白山與泰山建立聯繫的方式，長白山在清代的地理話語體系中獲得至高無上的地位。1712年的劃界促使朝鮮重新定義長白山和北部邊疆在王朝景觀和意識形態中的地位，他們從朝鮮史詩中尋找蛛絲馬跡，將長白山定為王朝的誕生地，並列入國家祀典。因此1885年清與朝鮮對邊界問題的處理，變成王朝地理知識的博弈。作者還將圖們江劃界與清俄劃界、清越劃界進行比較，說明不同的邊界思想如何在帝制東亞的邊界製造實踐中產生。清、朝劃界中使用宗藩原則，清、俄劃界則是近代契約精神的反映，清、越劃界中宗藩原則和準國際法並用，揭示清政府如何根據地緣政治變化調整其空間概念。

第三章作者分析19世紀80年代到20世紀初圖們江地區的社會形態，強調構成動態跨境社區的充滿活力的人與社會的互動。「間島」(Kando，日本稱為關東)一詞最早見於朝鮮文獻，指圖們江北岸(也包括西岸部份地區)第一批入境者定居的平原地區，大致相當於現在的吉林省延邊朝鮮族自治州。作者利用中、日、朝的史料，介紹間島的人口、土地、村莊、社會結構、族群、貿易，等等。間島原為皇家圍場，開放之初，佔地不受限制，實力雄厚的漢人成為地主(佔山戶)，朝鮮人多為佃戶或短工。但是當可耕種的荒地減少時，人們只能通過市場或繼承的方式獲得土地，於是出現朝鮮地主，以養子、購買或入籍等方式獲得土地。圖們江地區開放後，處於陸路和海運路線交匯點的琿春，成為「琿春—符拉迪沃斯托克商業圈」的中心。

第四章主要分析19世紀末20世紀初清朝、朝鮮、日本、俄羅斯對圖們江地區的治理，以及國際法在邊疆的使用。各政權試圖以建立國家機構的方式滲透到圖們江地區。就清朝來說，邊疆「內地化」是其目標。除了行政機構和軍事改革，還實行新政策，規定圖們江北岸的朝鮮墾荒者和避難者若選擇定居，必須剃髮易服，登記在冊，承擔賦役。作者指出，剃髮易服從根本上說是一種政治經濟措施，是為了確保清政府能夠控制土地和人民；對朝鮮地主來說，剃髮易服是保護財產的一種策略，並非被「同化」。俄羅斯在圖們江地區的滲透方式是建設中東鐵路和設立共管區。朝鮮方面，中央和地方對於間島問題的認知存在很大差異，地方精英要求國王與北京談判圖們江地區的行政管理權問題，但中央認為已經確認兩國邊界。然而地方官想要將圖們江北岸變成朝鮮領土，甚至出兵佔領。19世紀末20世紀初，國際法作為一種新的話語體系被用在邊疆地區。日本吞併朝鮮後，以保護朝鮮人的名義佔領間島，利用國際法，試圖重新書寫歷史，先是用「中立區」來描述關東，後又將其稱為「無主之地」。這樣，關東既不屬於清，也不屬於朝鮮，它是一

個自然形成的、無人居住的、中立的區域，從而將日本佔領間島的行為合法化。

第五章從多層競爭的角度探討20世紀初重新定義中朝邊界的行動。日本吞併朝鮮後，清與朝鮮的人口與邊界衝突轉變為中日之間的國家建設競爭，不同勢力圍繞領土展開鬥爭。面對日本的擴張，清朝派人調查並形成《延吉邊務報告》，該報告成為圖們江北部地方歷史、地理和政治的基礎性文件。而日本則派兵進入圖們江北岸，設立關東分部，對此，清朝以設立「邊防監督委員會」作為回應。在延吉地區，中日爭端可以從三個層面考察：一是中央層面，即北京與東京之間的博弈；二是省級層面，集中在徐世昌和伊藤博文的邊疆建設，即內地化、殖民化的競爭；三是地方層面，即吳祿貞與齋藤季次郎在稅收、軍事方面的鬥智鬥勇。在解決爭端過程中，雙方交涉的重點是圖們江邊界的合法性，也就是如何在現代國家概念框架內重新定位歷史上的領土權利，以及如何在新霸權主導的國際法條款中解釋東亞的過去。日本先是否認圖們江是中朝邊界，但為了盡快解決爭端，最終雙方根據國際法確定圖們江邊界。滿洲邊境問題引起中日朝知識份子的關注，宋教仁、內藤湖南、申採浩著書立說，根據自己的政治理想建構空間想像，雖然相互競爭，但也相互影響、相互塑造。

第六章主要考察20世紀初滿洲朝鮮人的身份政治，即中日朝如何重新定義滿洲朝鮮人。日本佔領滿洲後，從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進行殖民。中國方面，從將朝鮮墾民轉變為「中國子民」到限制朝鮮人入籍，雖然入籍仍與土地所有權相關，但政府試圖用居住期限限制入籍，而文化符號已經不重要了，因為這時的身份政治已經發展成主權建設的關鍵手段，而不僅僅是稅收問題。對於延邊的朝鮮人來說，他們如何自我定義？當「成為朝鮮人」不是他們的合法選擇時，當地的朝鮮精英在「成為中國人」和「成為日本人」之外，仍然有各種各樣的選擇，以確保他們在社會、政治、種族和文化方面的獨特身份。作者指出，當土地和人民分離、民族和國家分裂時，延邊為這些「無國籍人」提供建造「想像社區」的空間。

結語部份，作者敘述20世紀30至60年代圖們江地區發生的變化，介紹穆克登碑的消失與滿洲的轉型、中國朝鮮族的身份以及1960年代中朝邊界的重訂，回應前人關於「邊界」觀點。以往研究認為，邊界作為「劃定國家主權的線」，常常被視為現代的產物，這種論斷割裂過去和現代，現代變成從各種制度中「誕生」和「製造」出來。作者通過本研究告訴我們，無論是過去還是現代，土地和人民依然是最基本的要素，如何重新定義和安排這兩個要

素是處理邊界問題的關鍵，「現代」是從過去繼承下來的。作者還強調空間互動，中日朝三國地理和歷史的相似性決定其中一個國家的任何重大變化將立即重新定義與其他國家的關係。

本書論述1881至1919年圖們江邊界爭端和劃界的過程，但作者並未局限於「邊界」本身，而是為我們描述一個複雜多樣的邊疆社會。作者將圖們江地區置於中心，探討該地區如何成為不同政權、不同勢力之間進行地緣政治、經濟鬥爭的場域，以及在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影響下如何轉型，從而向我們展現「多邊之地方」(multilateral local)、「區域之地方」(regional local)和「全球之地方」(global local)。在分析過程中，作者兼顧中、日、朝的文獻記載，為我們提供不同的視角。但本書也有一些不足之處，可能作者為了全面展現圖們江地區的政治、經濟、社會，對某些問題的探討還有繼續挖掘的可能，比如社會結構、族群關係等。圖們江地區是19世紀後期逐步形成的移民社會，不同政權、各種勢力的介入究竟對社會結構產生何種影響？區域本身的流動性比較強，那麼在轉型的時代背景下，社會結構如何變遷？族群關係發生什麼樣的變化？在論述身份政治的時候，作者似乎更側重於國家政策，對於解釋不同階層的朝鮮人如何選擇政治身份，則略顯單薄。既然政治身份是可選擇的，或許還可以進一步探討身份的流動性。另外，族群認同對政治身份的選擇是否有影響，也是一個饒有興趣的話題。

劉建莉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

**前田正名著，楊蕤、尹燕燕譯，《陝西橫山歷史地理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238頁。**

本書原名《陝西橫山の歴史地理學研究》，副標題為「十世紀、十一世紀におけるオルドス沙漠南縁の白於山付近山地に関する歴史地理學的研究」，1962年由日本教育書籍社出版，為「東洋歷史地理研究」的系列著作之一。該書出版時為油印本，印刷、裝訂較為粗糙。在本書中前田首次對宋代橫山地區的自然景觀、民族、物產、交通道路、貿易等做了深入的研究。這部西夏學研究的著作早於香港林旅芝的《西夏史》（香港：香港出版社，1975），也早於吳天墀的《西夏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